



昆明样本： 地方治理创新与思考

Kunming Sample:
Innovations and Ideas on Local Governance

沈荣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昆明样本：
地方治理创新与思考

**Kunming Sample:
Innovations and Ideas on Local Governance**

沈荣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明样本：地方治理创新与思考/沈荣华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02-31527-8

I. ①昆… II. ①沈… III. ①地方政府—政治改革—研究—昆明市
IV. ①D62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5306 号

责任编辑：徐学军 朱玉霞

封面设计：漫酷文化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8.25 **字 数：**25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5.00 元

产品编号：052196-01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构路径与对策》
(批准号：09&ZD063)
的阶段性成果**

前　　言

我们依照“制度空间—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借昆明为例，解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律，具有实证意义。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创新，在当下法治建设初级阶段制度规范尚不足之际，推动我国地方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能动努力。

为了应对社会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规律，我们试图通过对昆明样本进行行政学理分析，思考这样的命题：目前，在客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我国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核心行动者的作用。任何地方治理的变革都无法避开地方核心行动者，昆明治理同样如此。

在仇和十五年主政历程中，仇和的魄力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亮点还是逻辑？仇和的风格是严酷无情还是蕴含着对改革大业的执着追求？仇和的治理是哗众取宠还是振聋发聩？我们早期概括仇和个性化特征为“用严厉的手段推动法治，用强制的方式推进民主，用行政的方法撬动市场经济”，究竟是肤浅的解读还是准确的刻画？本书无法绕开这些问题。

从客观上说，昆明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2007年以后，昆明采用压力式的发展思路，其关键就是核心行动者通过压力型体制的组织权威与压力式的组织手段，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向前发展。评论昆明发展样本，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一个人，那就是在江苏沭阳主政五年、后在宿迁主政五年、再到昆明主政四年的仇和书记。仇和任地方一把手的十四年期间，正好应对了我国改革开放中跨越式的发展阶段。仇和主政昆明以来，一向慢腾腾的昆明，突然也“白加黑”、“五加二”地全负荷运转起来，在“赶超”、“跨越”、“攻坚”与“大干”、“拼搏”、

“冲刺”中，显得更具有急迫感与使命感，争论由此而起。平心而论，这种治理方式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广为采取的典型模式。如果从昆明的现状与西南国际化都市的定位看，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机遇所逼”，不得不为之、必须为之、非如是不可；如果从理性的角度看，从现代法治与政治民主的价值去审视，其中一些具体做法似乎值得商榷，似乎可以找出许多不合理、不合情甚至不合法的理由。各执一端总是无法完整解读一个实际案例，更不利于将这个案例放到整个改革的轨迹中去考察。在此，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在经济普遍不发达、法治普遍不健全氛围下的快速发展与超常规建设，到底应该怎样拿捏其中必然性的分寸，分辨其中必要性的元素，识别其中合理性的成分，反思其中合法性的方向。

第一章，分析框架。“制度空间—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以制度与核心行动者的内在互动为逻辑，试图解释地方制度的变迁过程。一方面，核心行动者必须有必要的制度空间才能有效地发挥自主的功能和角色，在这种制度空间内，核心行动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力素质，推动治理理念的落实，并实现绩效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空间必须合乎科学，过大的制度空间会为核心行动者的权力滥用提供可能，从而导致治理的扭曲，而过小的制度空间又会大大约束核心行动者的能力发挥，同样会对治理成效产生负面影响。只要有制度空间，不同的核心行动者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有胆识，有魄力的核心行动者可以用足既有的制度空间，使效能最大化，并往往还能实现制度创新。而胆识、魄力有限的核心行动者则可能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地方核心行动者是从制度空间到制度创新的关键环节。要判断地方治理变迁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革新的关系，认识我国经济腾飞的秘诀，解读地方核心行动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地方核心行动者借用制度空间进行自主创新，毕竟是过渡时期的特有现象，由于制度不足与制度弹性等原因，导致了地方核心行动者作用的强调与突出。从长远的角度看，制度将不断完善，个人的作用将让位于组织的作用，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将取决于广大群

众，而地方核心行动者的主要作用将运用于制度的创新之中。

第二章，压力式治理。压力式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最常见的一种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是由现实逻辑与制度逻辑所决定的，具有我国过渡时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国地方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与人民的期望和党的要求相去甚远，存在比较明显的发展压力，因此，加温、加压是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制度逻辑是指我国特殊的体制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央地的特殊关系模式、地方财政压力和人事制度，都决定了地方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舒缓压力。现实状况与制度缺陷在昆明表现得都非常明显。研究昆明样本无法避开昆明面临的种种压力，其中交织着21世纪以来昆明陈旧的历史积淀与西南五市间的竞争态势，从而构成了昆明治理的主要变量，也是考量昆明样本密码的重要基点。

第三章，治理的组织依赖。压力式治理之所以能够有效推行并产生较好的绩效，有赖于压力型体制的组织权威。在昆明，压力式问责与场景式治理是这种组织依赖的重要体现。昆明通过强有力的责任主体、立体式的责任划分、严厉的责任监督、无缝隙的组织对接等组合，把这种压力式问责的组织权威发挥到了最大化的限度，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效应，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场景式治理包含显著的社会动员功能，其最大优点就是直观、快速，大大提升政府执行力，这是场景式治理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地方治理中仍然充斥着对传统的依赖，而公民社会成熟不足、民主法治还相对滞后，面对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场景式治理方式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于各地的治理，昆明则是其中一例。

第四章，生态环境的刚性限度。最佳环境建设和善治是执政理念的最高追求。昆明样本包括软环境与硬环境建设，前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治理，后者涉及一系列制度建设。

由于GDP主义的长期盛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的现象十分普遍。环境治理具有高投入、见效慢的局限，还因涉及多届任期的困境，常常呈现“公用地悲剧”。而昆明的环境建设在市场

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在滇池治理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威介入，层层推进，有效破除了部门之间的壁垒，忽视了任期的局限，初见成效。这在另一个角度检验了昆明领导层的前瞻性战略眼光和超强的领导魄力。在软环境建设中，昆明面对的是官僚体制僵化、行政低效、工作程式化、固步自封，长期成为政府效率、行政作风、良好环境的障碍。昆明直面顽疾，采用了重点治吏的“猛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昆明通过优化政治舆论环境、政策扶持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法治、人文道德环境的建设，取得了总体生态环境的明显成效。

第五章，招商引资。通过政府主导全面介入招商引资，为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外部动力，是压力式治理的重要手段。“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这几乎是所有地方治理的共识。在昆明样本中，无论是招商引资的规模还是力度，都占有重要的份额，直接体现昆明领导人独到的价值诉求。昆明领导人将招商引资明确视为过渡时期地方政府的特殊职能；昆明试图通过招商引资，训练一批懂市场经济的年轻干部和人才，重组干部队伍；昆明领导人将招商引资作为倒逼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市场元素。从而围绕招商引资展开了从理念到行为、从举措到机制、从组织结构到政策环境的探索。昆明在招商引资中采用领导挂帅、部门联动、对外驻点的方法，几乎与其他地方政府动员型治理模式别无二致；而昆明的目标倒逼、考核强化、责任管理、合力联办的举措，融进了制度化建构，实现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对握。昆明的招商引资模式，对经济后发达地区具有启发性与警示性价值。

第六章，关于能动式民主。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体系中，作为地方党政负责人往往有更大的权力，因而也有更大的能力，而普通公众则更多时候只是一种相对被动的角色。在地方民主中，作为政治精英的核心行动者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核心行动者本人的意识、能力和性格特征。在推进地方治理转型的具体路径上，从党内民主切入，再推进社会治理民主化，是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地方治理转型的一个方向。在昆明的现代化推进中，以昆明市委市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核心行动者，依据中国式

民主的制度安排，结合昆明市情，在集体决策与公民参与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即实施以地方核心行动者为主导的转型期能动民主，这是昆明经济社会效能化发展的领导基础与组织保障。从改革的角度看，昆明能动民主的实践探索，致力于场景式治理的制度化与能动民主的规范化，为我国地方治理中由政府主导向民众主导的转变，注入了活力。对地方民主转型发展具有启发价值。昆明样本中的“六政（正）”即党委执政、人大督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司法公正、百姓评政，激活了地方民主的结构性功能；昆明样本中的“四治（制）”即人治—人制—法制—法治逻辑，探索了地方法治的渐进性规律；昆明高层决策的民主机制，在建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之外，主要领导人与市委常委一对一谈话、与相关人士交心的沟通方式，是地方区域内民主的试行探索；昆明民众参与的“四权”探索，即任前公示探索知情权、公推公选探索参与权、公推直选探索选举权、全民公示探索监督权，体现了民意倒逼民主的主观立意，昆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拓展了地方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当然，昆明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困惑，这种困惑在各地民主建设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七章，公民评价与满意度。如何评价压力式地方治理的绩效，不能仅看GDP的增长和各种经济数据的变化，也不能仅从民主法治等价值层面的标准来判断，应该从公众的评价中去把握。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前在昆明市区调研获得的数据，特别是面向昆明市民所作的“昆明样本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发放，其中关注到昆明样本的内涵与价值认同，包括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工作风格、施政方式、决策过程所带来的心理感受等内容。我们对昆明样本的判断，主要通过客观数据和民众态度来认识昆明压力式治理的价值与意义。

第八章，理论归纳。通过对昆明样本的实证考察，我们重新回到“制度空间—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创新”的思考框架。我们着重论述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弹性、制度不足、制度剩余、制度嬗变与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空间的关系。

个人作用不可忽视与低估，但是，也不可迷信与崇拜。当下，地

方核心行动者在地方治理中的个性张扬与人格魅力，使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呈现出丰富多彩与五花八门的态势。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法治逐渐健全、民主继续推进，地方核心行动者的个体能动性必将过渡到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体制外的合理性转变到体制内的合法性，这是昆明样本对认识我国地方体制改革规律的贡献。要实现这种过渡需要具备三个基本前提：第一，自律机制。地方核心行动者只有从公心出发，坚守公德底线，遵循公律（规律）、符合公意（公共意志），才能抛弃主观性与随意性，为制度完善增添能动性价值；第二，他律机制。地方核心行动者的创新只有上升为制度规范，就是将其个体行为中的优势与经验上升为制度资源，将其个体行为中的不足与失误转化为制度防范，从而给地方政府创新塑造生动的制度基础；第三，用进一步开放来倒逼制度化进程。其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开放主要是将自己的心扉向群众开放，将运行公权力的行为向社会公开。地方核心行动者只有将自己融于群众之中，一心为了群众，才能将个人有限的智力、能力、魅力、魄力汇成真正推动地方治理的制度化力量。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地方核心行动者个体功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最终要让位于集体的领导制度，并在确立民意主导的进程中实现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们得出深切的体会是：研究昆明样本，第一需要从体制上反思简单化、单一化、单向化的思维方式，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治理理念必须与时俱进；第二期盼营造宽容的人文环境，来锻炼社会的治理能力，并在对等的框架下重新定位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对话结构；第三正视地方核心行动者，不管是真心改革、假心改革还是借改革谋私利，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个人价值最终将归于制度创新之中。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分析框架	1
第一节 客观背景与核心概念	2
一、客观背景分析	2
二、核心概念诠释	3
第二节 制度空间—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创新	10
一、理论架构	10
二、适用性分析	12
第三节 样本的基本概况	14
一、样本选择	14
二、研究思路	20
三、主要内容	20
第二章 压力式地方治理的逻辑及其绩效	24
第一节 压力式地方治理的现实逻辑：发展的压力	26
一、地方治理中的经济赶超冲动	26
二、地方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困境	28
第二节 压力式地方治理的结构逻辑：三重体制形态演化	32
一、行政体制与压力式地方治理	32
二、党政关系与压力式地方治理	36
三、财政体制与压力式地方治理	40
四、人事制度与压力式地方治理	42
第三节 压力式地方治理下的政府绩效：基于昆明历史 纵向统计数据的分析	46
一、金融危机夹缝中推动 GDP 稳步上升	46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打造“绿色 GDP”	54

三、招商态度发生实质性转变后生态产业快速发展	58
第四节 压力式治理下的政府绩效——基于西南五市的横向对比分析	60
一、GDP 的比较分析	60
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较分析	61
三、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	62
四、城市凝聚力的比较分析	63
五、小结	63
第三章 地方治理的组织依赖与政府执行力提升	67
第一节 地方治理中的“有形之手”：组织权威	68
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权威	68
二、基于组织权威保障的政府执行力提升	70
第二节 政府执行力的新形式：压力式问责	71
一、昆明行政问责的历史与现状	72
二、昆明压力式问责机制的特点	77
三、昆明压力式问责的评价与反思	89
第三节 场景式治理中的行政执行力提升：集体观摩	92
一、场景式治理的概念与特征	93
二、集体观摩的组织过程	94
三、昆明集体观摩探究	97
第四章 地方治理空间的拓展：环境建设的刚性介入	99
第一节 地方政府竞争转型与环境建设	100
一、地方政府竞争力：硬竞争力与软竞争力	100
二、资源耗竭型恶性竞争的困境	101
三、从恶性竞争到基于环境创建的良性竞争	104
第二节 发展的硬约束与硬环境建设	105
一、昆明发展中的硬环境约束与困境	105
二、硬环境建设中的政府强力主导	108
第三节 软环境建设中的硬手段	122
一、软环境建设的“硬着陆”	122

二、昆明软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	126
三、总结与反思：铁腕式的环境治理模式	130
第五章 地方治理创新的后发机制：招商引资	133
第一节 昆明招商引资的理念与特色	134
一、昆明招商引资理念的提出	134
二、昆明招商引资理念及其特色	135
三、昆明招商引资执政理念面对的质疑和回应	138
四、昆明招商引资理念的成效	140
第二节 “全员招商”：昆明招商引资的行动策略与组织实 施	143
一、健全领导组织体系，形成全新招商态势	144
二、强化组织推动与责任落实	146
三、优化发展环境，改善公共服务	149
四、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提高招商引资效益	151
第三节 昆明招商引资的经验启示与反思	153
一、招商引资是过渡期政府职能的集中体现	153
二、招商引资是培养年轻干部和市场经济人才的有效途径	156
三、招商引资内涵：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转型的价值意蕴	157
第六章 地方能动式民主与地方治理民主化	159
第一节 地方治理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与实践向度	162
一、转型发展背景：我国地方治理民主化诉求	162
二、宏观制度安排：“三位一体”的地方治理民主化	165
三、实践向度：转型期地方治理民主化的走向	168
第二节 地方政府能动式民主的昆明实践	172
一、能动探索——地方治理创新主脉络	172
二、集体决策——常委会能动机制	178
三、参与发展——民众“四权”实践	183
第三节 地方治理民主化：昆明样本的价值与反思	189

一、昆明样本的多维视野	190
二、活载体的实践价值	192
三、小样本的内在限度	195
第七章 地方治理绩效的民众回应：公民满意度分析	199
第一节 “昆明新政”公众满意度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201
一、“昆明新政”公众满意度调查基本情况概述	201
二、“昆明新政”公众满意度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203
三、思考与建议	215
第二节 “昆明新政”公众满意度问卷调查的深度分析	
——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	216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7
二、“昆明新政”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构建	218
三、“昆明新政”公众满意度评价体系的实际应用	222
第三节 基于公众满意度评价视角的“昆明新政”：	
建议与思考	226
一、公众满意度分析的基本结论与建议	227
二、压力式发展的昆明样本：绩效评价与反思	228
第八章 总结反思：地方治理优化与中国现代化	231
第一节 地方治理的逻辑：效率主义秩序模式	233
一、效率主义秩序模式的生成逻辑	233
二、地方核心行动者主导下的效率结构	235
三、制度空间拓展中的双重绩效	236
第二节 地方治理的契机：结构创新	241
一、民意导入：改革创新的方向	242
二、工具更新：改革创新的技术导入	245
三、核心行动者行为制度化：体制改革的关节点	248
第三节 地方治理的转型升级与中国现代化	250
一、地方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关键：塑造制度化治理	250
二、以地方治理优化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	252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70

第一章 一个分析框架

伴随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地方政府一直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最重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角色、功能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中脱离出来，逐渐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以分权让利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关系演变，使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力和行动空间，这种分权让利是构成“中国奇迹”的重要源泉，但也在地方形成了两种看来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第一，在一个法治和民主资源都十分稀缺的社会背景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仍能奇迹般地在制度空间的运营、拓展中不断丰富，并构成一幅幅壮美的地方治理精彩画卷。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积极行动，开拓创新，不断进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推手。第二，同样令人感到尴尬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之便浪费严重、中饱私囊、贪污腐化。地方政府官员从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这种“扶助之手”和“掠夺之手”并存的现象，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中央地方分权后，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空间与行动空间，由于改革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分权结构尚不能一步到位明晰，分权和行动空间的规范尚不够完善，因此，分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制度空间的理解与把握，取决于他们对这种行动空间的运用能力及其他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为了探索改革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规律，本书提出一个试图破解改革困境的分析框架，这就是“制度空间—地方核心行动者—制度创新”，并以昆明为例，试图探索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一般规律。

第一节 客观背景与核心概念

一、客观背景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复杂格局之中：第一，在历史上，民主传统与法治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失，以致当下地方政府改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体制改革必须与市场体系发育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它同时还要实现法治、民主制度渐行与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有效衔接。第二，在文化上，长期的官本位导向与奴化人格的社会心态，一直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使当下地方政府体制改革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内生性的驱动源，地方政府必须充当改革的动力；另一方面，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体制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第三，在结构上，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使地方政府主体性角色往往存在两难。一方面，地方服从中央的总体结构，使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地位有限；另一方面，在中央地方放权的改革中，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空间往往大小不定。第四，在方略上，我国改革基本处于经验不足、理论不足、整体思路不足的状态，致使地方政府改革呈现着纷繁复杂的形态。我国渐进式改革在触碰深水区时的“投鼠忌器”，也促使地方不得不在“无法可依”的境况中各自思考规避策略，举步维艰。第五，在激励机制上，长期以来的GDP导向，使地方政府的效率主义成为悖论。一方面，发展经济的旗帜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GDP主义浪潮中，也有不自觉偏离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反而侵蚀了改革的成果，并在实践中显露出令人担忧的负面效应。

我国行政体制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自下而上，由星星点点的地方创新片段组合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宏图，其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思路、风格、魄力等个人因素，构成画卷生动活泼的点睛之笔。要探究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律，从研究地方核心行动者与制度互动关系入手，不失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二、核心概念诠释

(一) 制度、制度空间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塞奇 (Anthony Saich) 指出，对中国地方治理的研究，迄今为止的概念工具基本上都缺乏实际解释力。造成这一状况的基本原因在于人们“试图将中国经验的销子插入西方理论的洞口”。^① 换句话说，简单套用西方概念来分析转型中的我国地方治理是无济于事的。当下，地方政府行动逻辑在地方核心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中，突出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治理风格。什么是制度？所谓制度就是赖以指导整个社会有效运转的规范资源与方式的总和。广义的制度指整个制度体系（包括有形的国家法律规范和无形的社会习俗等）；狭义的制度指某一种涉及微观行动者的具体规定，“就是在各种政治经济单元之中构造着人际关系的正式规则、惯例，受到遵从的程序和标准的操作规程”，^② 制度既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系统运行的环境背景，也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推动政治系统运行及变革的规范要素。它的基本功能是决定特定场域内参与者的身份、偏好与策略选择。

转型期的地方治理，制度性资源丰富多彩，可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优化与制度滞后同时并存。这种制度之间的缝隙，既塑造了地方核心行动者，也给地方核心行动者提供了行动空间。其中，“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不动摇的刚性形态，准确表述了国家与人民的意志，为地方政府及其核心行动者规定了行动的方向。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也同时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③ 认为中国的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执行

^① [美] 托尼·塞奇：《盲人摸象：中国地方政府分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 (4)。

^② Bo Rothste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3~135.

^③ [德] 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5)。